

【哲学科学研究】

为当代科技辩护

——兼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观*

毛勒堂

(云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 云南 昆明 650092)

【关键词】 当代科技; 负面效应; 公正态度; 理想“家园”

【摘要】 本文针对现当代一些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学者和社会学家把当代科技运用过程中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归罪于科技本身, 将科学技术当作是当代“世界危机”的“罪恶之源”的思潮进行分析和评述, 并认为“科技无罪”, 倡导确立用正义之念、善良之心、感激之情去把握科技之剑的科技理念, 从而营造一个理想的“家园”。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00)01-0061-03

Defend for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O Le-t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Key words: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de-effects; fair and justice attitude; ideal world

Abstract: Some contemporary thinkers, philosophers, scholars and sociologist try to blame the side-effects during the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el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us is regarded the source of the so-called “Global Crises”. To counter this opin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of no problem or guilt, and it advocates a fair and justice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powerful “sword”, and therefore, to build an ideal world.

在21世纪到来之时,回首20世纪的一路风尘,世界依旧五彩缤纷。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继续蓬勃向前发展,并以信息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与之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于一个病态的世界:“土地越来越贫瘠,天空弥漫着烟雾,河流充满着污染。”这种病态不仅表现为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表现为精神文明的失落,“全球危机”、“单面社会”、“单面人”、“单面思维方式”日趋凸现。于是人们提出了对当下生活方式的质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又成为现代人思想探究的主题。于是有人认为“全球危机”,价值虚无乃至信仰危机,需要从科技身上解剖,将此归罪于当代科技,并进而得出结论:科学技术使工具理性极端膨胀,它使人们丧失了精神的家园,成为物质和技术的奴隶。因而,当代科技的效应及其定位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又一次格外引人瞩目。

现当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学者,在总结和反思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明时,对科学主义、科学理性及科学技术进行深入批判和激烈抨击。如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明确指出,欧洲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欧洲人性的危机和文化精神的危机,认为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即探问人生有无意义。科学统治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人丧失精神性,生活世界成了被科学遗忘

* [收稿日期] 1999-06-03

[作者简介] 毛勒堂(1970-),男,哈尼族,云南红河县人,云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哲学、管理研究。

的角落。又如,本世纪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科学是有极限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说科学理性的发展导致了意义世界的危机。尼采在谈到现代自然科学的结果时认为,科技不能为人生提供目的与意义,它只能在对象领域中得到可以确证的有关“真”的知识,科学无法进入人的信仰世界,它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服从于人生的探求,只有“人的意向性之光给世界以意义。”(萨特语)

在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法派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理论出发,从人在技术社会的异化状态入手,展开对当代科技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形成自己的科学技术观。法派的主要理论家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看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日益从早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转移到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法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当代科技的消极的社会功能的剖析上,它的中心是这样诊断,即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是如何异化为一个新的控制形式,如何造就“单面社会”、“单面人”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如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攻击的目标首先指向当代科技,将当代科技当作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当作造成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单面性的根源,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决定性的东西是科技,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业装置”,定义为按技术的观念和结构而运转的政治系统。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决定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技绝不是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他看来,科技统治也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科技的进步本来可以使生存环境改善,社会结构日益合理,人变得自由、自主、富于创造性。但实际恰恰相反,技术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未能改变人的命运,获得自由,反而使人日益变成技术、物质生产资料的奴隶,人同社会、他人、自己的工作相异化,技术和文明对人类作了全面的管理和统治。而法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突出地把“科学技术”直接地作为他的批判对象,并认为科学技术是必然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消极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法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它想告诉人们: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摆脱自然强制性的工具,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是科学技术的悲剧。因而对科学技术的价值产生了失望情绪,认为科学技术造成现代社会陷入困境和危机,从而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显然这无异于我们在舞剑时剑法不熟或握剑不当而伤了自己,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剑不是东西”。当然,法派对西方文明理性观的历史考察则是发人深思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在世界的统霸,确实使人们对前技术理性时代的许多可借鉴的文化精华曾一度采取不应有的漠视乃至无视的态度。从这一点看,他们的痛切反省,恰好为我们的重新自觉提供了一种契机和参照框架。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事业,积极进行“两个文明”建设,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尽力避免重走西方人曾走过的弯路。从这一角度看,法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是法派的问题在于对科技的批判过了头,似乎使人感觉到有一种要彻底抛弃科学技术,才能使人找到一种真正的“家园”的倾向。同时,法派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科技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所造成的种种消极、异化现象归罪于科技本身,夸大了科技的负面效应,否定了科学技术本身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陷入了反科学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

当前也有一些国内外的学者,把“全球问题”、“意义危机”等归咎于科技本身,并认为科技的本质就是要追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所以导致地球资源的危机,从而把当代科技当作全球问题的“罪恶之源”。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科技追求的是利用资源的效率的最高化,而不是利用资源的总量的最大化。在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下,科技本来有能力使人类仅仅利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满足同样的生活需求。但是,由于利益和各种动因的驱使下,使得现有的技术得不到充分的推广,新的技术总是不被用来以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满足人们旧有的需要,而是被用来制造新的奇特的产品,挑逗起人们新的消费欲望。因此,贪婪的利益追求是导致“全球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非科技进步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

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言,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追

求真理,尊重事实的特性。同时,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巨大杠杆,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它不仅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事实上,当代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虽然资本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但矛盾存在的形式及解决的方法,由于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可以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如通过政府调节经济、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和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种种矛盾。科技革命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财富,为国家调节生产关系、引导市场、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创造了条件,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充满活力。历史是诚实的老师,痛苦的经历是生动的教材。反文明、反科学并不能把我们引向现代化建设之路,在历经近代百年的屈辱之后,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从劫难中明白了一个重要的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今天,现代化已成为历史的趋势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也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从何着手呢?对此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极大作用的事实出发,深刻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科学技术对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具有较高效率的生产力并应用于社会主义生产,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首先,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现代化一方面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建立在疯狂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政治统治,军事征服的方式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夺,以牺牲殖民地民族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作为自己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今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也不会通过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掠夺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我们只有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大力发展高、尖、精的现代科技,创造较高效率的生产力,去开拓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其次,就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人口众多且素质较低,人民贫穷。这无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拦路虎”。再次,虽然现代化的每一项新的科技突破都为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次契机,但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财富和知识积累来参与,科技革命的实际进程往往不是减缓,而是在加剧着贫富分化,发达国家仍利用高科技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和平地”掠夺资源,获取利润。对处于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环境的中国而言,其现代化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该怎么办?邓小平同志意义深远地指出:“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应该是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满足。而这一切的实现靠什么呢?一靠先进的科技,二靠科学的管理。

至于言及当前由于“科技带来”的“全球危机”、“意义危机”问题,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解决“科技带来”的“问题”同发展科技走的是一条道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发展历史以及今天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现代化工业社会逐渐步入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便是很好的例证。

本文的结论在于科技本身无罪。如果“科技有罪”的话,罪也不在于科技这把利剑本身,而在于“握剑之手”、“舞剑之法”。因而,我们的科技理念应该是:磨好科技之剑,用正义之念,善良之心,感激之情去把握温暖的科技之剑,舞好科技剑法,从而营造一个理想的“家园”。